

說實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這個時候說實話尤其不容易，但是又非說實話不可。譬如一個人生了病，求神拜佛，諱疾忌醫，當然是自欺自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弄到藥不對症，有時也會斷送生命的。正當的途徑，祇有請教名醫，探尋病源，認真診斷，一絲不苟的醫治下去，才能希望早日康復。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第一次就任總統時，當時美國為經濟恐慌所籠罩，百業蕭條，舉國恐懼，羅氏當時有一句向國人呼籲的名言，就是『現在是忠實而勇敢地說出真理，說出全盤真理的時期！』

現在時局真是嚴重，抗戰迄今，多年戰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交通阻塞，資金外流，生產萎縮，農村衰退，士農工商，均難以為生，失望與不安，逐漸瀰漫。今當行憲伊始，如果文過飾非，粉飾太平，固然不可。祇是講求應付，緊急措施，不事根本之圖，又何嘗不會自誤。現在局勢雖非不治之症，如果說它已是百病叢生，當不過分，果真如此，那麼認真診治，已是刻不容緩的了。君子如能自強不息，首須有檢討自身的能力，再由此而策勵將來。說實話，自我檢討，自我創造，決不會增加失望與不安，相反的，倒是排除失望與不安的惟一途徑。因此現在是到了說實話，說出全盤真理的時期了。

說實話

(代發刊詞)

說實話為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話說來甚長，約略言之，可分下列幾點：首先必須根據真理，真理不是容易得來的，惟有人類已有的科學知識，中外歷史教訓，和對於現實的正確認識，有系統的探討和大膽的思考，才能得出比較近於真理的實話。再則不可抹殺問題，就是說不可因事實的過慮，或已有的公式，因此把嚴重問題，輕輕放過。第三不可歪曲事實，事實是錯綜複雜，互相關聯互為因果的，如果對某一事實認識不夠，或任意強調某一事實，忽略某一事實，如此對於事實，發生人為的擴大和縮小，孤立和割裂，自然就難於說實話了。第四必須有說實話的條件，這就是說必須有思想，言論和批評的自由。文人相輕，固執己見，各立門戶，以及缺乏集體研究互換知識的精神，這都是有礙於真理的探討。缺乏求知之雅量，對於不同意見，即斥為異端，甚至使用權力。橫加干涉，這簡直是進程途中的阻礙氣球。第五不僅要有自由，而且不可有偏見，凡事都應就事論事，不可滲入私見，不可以私害公，因人廢言，因人立論。甚至各立門戶，各自尋求有利於自己的目的，任意發揮排他感，這都是要不得的。

自辛亥革命到抗戰勝利，中國經歷千辛萬苦，今日才獲得民族復興的大好時機。直至今日，國家和人民，仍在百般痛苦中掙扎。痛苦有時令人失望沈淪，有時令人振奮自強。多難可以興邦，從多難中興邦之道，就在於澈底革新。現在一切的一切，都繫於自我革新，革新才能自強，自強才有前途。至於如何革新，其要點在那裏，從那裏下手，採取何種步驟，這些都須從長計議。對於這個重大問題，不論國人有何意見或商討，但是說實話是首先要做到的，是先決的先決條件。

從戰亂中挽救中國，中國需要統一和民主，從貧病愚中挽救中國，中國需要科學和工業化。我們主張循此途徑，以求革新，對於這種富有積極意義的革新，名之為『創進』。本此認識，發刊這一創進週刊。它同時又是國人的公共論壇，歡迎國人根據說實話的精神，來發表他們的真知灼見。任何問題，都不免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地方，除文責由作者自負外，祇須文章確有內容，創進就將它發佈出來，以供國人參考和商討。同時我們希望作家和讀者都能愛護本刊，予以有力的支持，使其成為說實話的創進論壇，今當發刊之始，本社同人特以說實話一點與國人共勉。



從政治中解放科學

——一個新時代的呼籲——



定閱

希臘人在紀元前五六百年，憑着他們愛智慧崇理性的天性，追探宇宙，尋索人生，他們在人類文化史上，寫下光榮的一頁，替人類的科學奠定了一個基礎。這朵奇花異葩，可惜波希戰爭以後，把希臘人的科學精神斷傷殆盡，到了馬其頓的鐵蹄壓境，希臘人也沒有勇氣抵抗了。亞歷山大死了以後，希臘人已經無法復興。從茲這愛自由、崇理性的民族，即變為羅馬政治皇權下的犧牲者。希臘人的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已就湮沒無聞。

經過了中古一千年的教權的壓制和政權的腐敗。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成為不可尋覓的神祕，人們在上帝的威力之下。永遠的不自自瞻自思，人們在教皇教士和封建君主的壓制之下，只有俯首帖耳的聽他們擺佈，不能稍有反抗，沒有理想，更沒有特獨的精神。中古的人民，像為人奴役的牛馬，他們不自覺也無法自覺，科學的思想與科學精神是教權中所不會產生的一個夢——人們也根本無此美麗的夢。到了十字軍東征，從東方帶回新的刺激，從東方帶回了古希臘人的典籍，歐洲的人民才醒覺了回來，像一只巨靈似地，從夢裏醒覺了過來，才發見自己的偉大，才追求「人的王國」，以人力戡天，再探索宇宙的奧秘，事物的幽邃，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又再生了。人們才有勇氣擺脫掉宗教的束縛，政治上的腐臭，努力的找尋真理。哥白尼(Copernic, 1473—1573)的天體說，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理想，布魯拿(G. Bruna, 1538—1600)雖然因為相信哥白尼的學說，宣傳哥白尼的學說在羅馬受焚刑；七十餘歲的加科諾(Galileo, 1564—1642)受縛於教會，但是科學終又從宗教和政治中解放出來。人類發現了新的宇宙系統，人類也發現新人生的價值。於是科學在近三百年來，日瀉千里，不可遏止。

希臘的科學是被戰爭與異族毀滅的，中古人的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是被宗教與政治扼殺的。西洋一部科學發展史，也就是一部科學與政治宗教的奮鬥史。科學的思想必在大氣磅礴，胸無塊壘的情境之下，才能有所孕育，才能有所成長。換句話說，科學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之下，才能脫胎而出。希臘的科學思想，全在希臘人有求知的精神，而希臘之所以有其求知的精神，全在其能生活

在自由的城市國家之中，能思想自由，生活在一種無窒無掛礙的空氣中，然後希臘人才有那種探本窮源，愛智愛美的精神。所以後來，一到了自由生活受了抑制，希臘的民族精神也衰頹不振，科學精神凋謝了，科學思想枯萎了。這是不合理的制度使希臘從茲一蹶不振。

中古之所以無法產生科學思想，是中古人根本無科學精神。中古人之所以無科學精神，是由於中古人在教權政權壓制之下，在教皇與教士與封建主的統治下，人們無從呼吸自由的空氣，擺脫不了精神上的桎梏。人們甚至連精神上的桎梏也受之如飴。中古政治上的黑暗，宗教上的腐敗，扼殺人類的靈性，扼殺人類求知新精神的能力。這是政治與宗教使中古的歐洲人停滯在黑暗之中，使他們無科學，無思想。

十七八世紀以後，科學引導人類走上了一個新的局面，人類的國度擴大，人類的權力也擴大了；人類的宇宙觀改變，人類的人生觀也改變了。到了十九世紀，人類把他所努力追求的新知識又實際的應用於人類生活的改進，人類從理論跨進到技術。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的發明與應用，更是一日千里。人類的生活不是以往的民俗與德型可以滿足的，人類於是創造較新的民俗與德型，人類的制度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也被這些新技術所改變了。科學於突飛猛進的年紀，却闖下滔天大禍：自十九世紀以來，人類即不斷的為新舊制度衝突下的犧牲者，技術的應用，產生了都市，產生了近代國家，更產生了企業的組合。拉斯基(H. J. Laoki)說得最好，「我們這時代的技術條件，使控有生產工具的一些人具有了較諸以往任何時代遠為龐大的力量。我們的亞歷山大和凱撒們以及拿破崙們，已不再是披荆斬棘，創建帝國的偉大軍事首長；他們變成了迷人而有權力的企業組合。在他們驅策之下的無人跡的沙漠，會成為戰場，而匹次堡和科文特里的工人們，或魯爾和西里西亞的工人們，可以被動員起來，被決定其勝負。這些工人們不但不知道他們勞力被使用的真正目的，而且深深的相信他們為美國或英國，德國或波蘭而工作，他們帶着一種希望而辛勤努力，這希望只是他們主人翁的伴語，如果他們支持下來，勝利到臨的明天將是提

高他們生活水準之夢想兌現的開始：職業安全的保障，會給他們的生活增加光彩與高貴，使他們免於衰老殘年為赤貧煎熬得無可如何之時，常縈繞的恐懼。然而當他們努力真個獲致勝利之際，他們以前所聽到的諾言之兌現，却非統治者的能力所能及，因為踐約的結果，將會動搖政府信任或招致混亂，或移轉政權入於另部份人之手，而由於他們本身缺乏才幹或不具有使其順利推動的地位，政府權力歸他們行使定會整個的毀滅。」（現代文明的危險，據張文譯文）這是顯示我們，科學與技術，使人類走上毀滅的路途。所以自從工業革命以後，人類的制度始終沒有能與生產力配合，人與人的關係始終沒有和諧安定，社會學家如烏克朋（Ogburn）稱這種現象為文化脫節（Cultural lag）因為文化脫節人類淪在困苦、災禍之中惶惶不可終日。不幸的，是這一個脫節的現象還沒有趕得上彌補，人類正在喘息掙扎之中，又是晴天一霹靂，——原子的應用的發明。

原子的應用，一開始就不祥，牠被應用為殺人的工具，為政治家或少數的野心家作為攫取某些目的的手段。人類方在波濤洶湧的技術文化中掙扎不定，企業家的和為企業家所擺佈的政治舞台，已經使人類走入毀滅之途，又闖來了這末一隻黑馬，於是人類更是張惶失措，日趨滅亡。人類的社會制度原已無法應付工業革命以後的新問題，企業家利用政治，國家作為吸血的工具，科學精神早已成為可懷戀的詩篇，科學與技術不再是為人類服務的工具而成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工具，或某一部份人剝削另一部份人的工具，成為人吃人的工具，成為人類毀滅自己的工具。培根（Francis Bacon）原來是想利用科學，擴大「人類國度」的領土，讓牠征服自然，為人類謀福利，那知不到三百年又就一再的演出慘劇，人類只是利用牠擴張一己的私慾或少數人的私慾的領土，那知時至今日，科學之為政治野心家所統制，為他們所利用，其悲慘的局面，竟愈演愈烈。在這雲風緊急的國際關係之中，人類所忙的不是希臘人所追求的智慧，所崇尚的理智，也不是文藝復興以後，人類所追慕的新精神，新天地，而是如何的在想盡方法殺人，吃人，然後再毀滅掉自己。不少的科學家們也沉淪在這個火坑之中，無以自拔，若干有識科學家，如愛因斯坦（A. Einstein）赫胥黎（Huxley），却爾（Hall）對這個死滅的局面已經在呼籲了，然而政治家們在企業家們所擺佈的政治舞台上並沒有肯低下頭來，替人類的前途打算。科學思想早晚即可能被扼殺，而科學的精神已在沒落了。

再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情形吧。中國文化史中科學思想的發展遠不如西方之盛。但中國並非無科學。天文、算學、音律、藥物、在遠古的時代即開過

光輝的花朵。工程技術如李冰的水利，張儀的地動儀，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的發展，是中國人常常在引為無上光榮的。中國發明養蠶術時，發明陶器製造時，西方正在草昧時期。在紀元前三四千年，中國醫學已經有了可觀的基礎，可知中國是有科學思想的。熊十力先生以為「周世諸子百家之書，必多富於科學思想，秦以後漸失其傳」（見熊十力：略說中西文化，學原第一卷四期）此語實有其道理在，絕非一般俗論可比。中國在明末清初，因為西洋科學的輸入，我們的文化中添入不少的新因子。在天文、算學、工程、醫藥、地理、邏輯、農業諸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和驚人的成就，但自康熙以後，這科學的曙光又暗淡消沉了。這個時代中以新的態度能接受新精神新科學的是徐光啓，李之藻，求中國科學獨立的有王寅旭，梅定九。都給中國科學開闢一條新路，但是為什麼自秦以後，中國的科學思想便漸次失傳？明末清初的科學的新生機，為什麼至康熙以後，又沒沒無聞。清代末年，中國的有識之士，目觀國事岌岌，力倡西學，為什麼西學倡到今天，中國的科學始終不能發煥異彩？西洋科學發展史是一部科學與政教的奮鬥史，尤其是與政治奮鬥的史蹟，斑斑可考，目前且受着政治的扼殺與控制而日趨衰頹。中國的科學不發達，中國科學的曙光如同慧星一般地，一閃而過，是否也是由於政治。熊十力先生在略說中西文化一文中以為先秦豐富的科學，「經秦人摧毀，與六國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後大一統之局，人民習守固陋，其亡殆盡，無足怪者。」這是說明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湮沒，是由於政治的因素。秦的統一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制，但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損失。牠使古代中國人，喪失追求真理的精神，窒息人民探本窮源的智慧。中國的科學的萌芽在「耳語業市」的政治權力之下，被摧毀了。

熊十力先生倒沒有替中國的傳統思想辯護。他以為中國古代儒家的反己之學，素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正統派，再觀道學與儒術並行的情形，中國人是一知不外馳，情無辭執，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無追求自然的因素，只講人倫的結果。他的看法也正是我們的看法，中國人之所以無科學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無科學的精神之存在。但是熊先生以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希臘人之愛好知識，向外追求，其勇往無前的氣概，與活潑的生趣為科學思想的根本條件之所以有差異的，是由於地理的環境所造成。我們以為地理的因子似乎不能成為主力，其主力仍是政治。否則為什麼中國的地理環境在秦以前有科學思想的可能；為什麼漢儒的玄學，頗有西洋產生科學的玄學精神；為什麼在明末清初曾經有過科學的曙光？這其中一定尚有人為的因子存在，反之證諸希臘的哲學的

興衰亦然。也是由於人為的因素所使然的。這人為的因素，就是政治。前面已經說過，秦的專制的政治，扼殺中國人的靈性，秦以後的情形亦復如此。譚嗣同說得最切當，「二千年來之政治，秦政也。」中國自秦以後，專制政治一步為一步的逼緊，在天天怕把性命丟掉的威脅之下，如何能有那種大氣磅礴，胸無塊壘的精神去追求外物，探索奧秘。

儒家的思想是窒息科學思想的因素之一，但此種思想之所以能成爲中國的傳統思想，全由於被專制的統治者所利用與維持，其中屢雜了若干其他的成分，孔子的面目改變了。但孔子的精神沒有改變，儒家的傳統精神未改變。李卓吾云：「中國二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之思想爲思想；二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在以孔子的思想爲思想的籠罩之下，在以孔子的是非爲是非的統治之下，祇有受帝王的統治權的支持，那能有那種如希臘人之愛知慧與理性的精神，那能知道追求新天地，新精神，新知識？中國的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學而優則仕」，反正統治者也有一套取士的方法，不怕你不入我彀中，到了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讀書人，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思想已有一千多年的貧血症，走到這個局面，那能再有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的孕育和產生。王陽明的「致良知」，對於理性崇拜運動是一針興奮劑，但是爲當時官僚政客，士人宦官所反對。這個運動究竟未能普遍的成爲中國之復興的主力。到清末統治者權力崩壞以後，西洋歷算輸入，中國的知識分子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都帶着萬分勇氣接受新知識和新精神。這個風氣一直保持到清康熙間，從萬曆（一五七二年）到康熙之末（一七二二）在此一百四十九年之中，不斷有西方科學的輸入，中國的科學真正開始新生，然而到了雍正出來，他沒有康熙那樣的愛好自由，他的皇位本是從陰謀篡奪中弄來的，對於知識思想加強控制，文字之獄，已使一般知識分子喘不氣來。雍正元年（一七二二）又放逐耶穌會教士，中國的學術又和西洋斷絕了。別人在追求新天地新知識的時候，我們只有在血脈中苟且偷生，向統治者搖尾乞憐。這個局面，科學思想早已絕跡了，只有一班考證學者，尙然保持着一點科學的精神，去追求典籍，但終以政治的扼殺，科學的思想總是無法產生的。到了晚清末年，吃了外國的虧以後，中國才又想起「西學」來，然而當時接受「西學」的是接受別人的技術，而不是接受別人的思想和精神，鬧了一百年的「西學」，還是絲毫無補於中國科學的孕育。近三四十年来，表面上，是政治上有了一个轉變，實際上統治的權力是轉移了，統治的性質似乎並沒有改變得多少，所以三十年來的中國科學仍無法一日千里。政治上的腐化，黑暗

，恐怖，混亂，使知識分子，也是惶惶不可終日，戰戰兢兢，遍地荆棘，連苟全生命尚不易，那能有勇氣再追求新的知識新的天地。加之在國際風雨之中，西洋科學已被少數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窒息。我們又何能擺脫掉這個迷陣？企業家所擺佈的政治陷井，也漸漸侵蝕到中國政治的園地。中國政治除了封建的勢力外，又闖來了一個不可抗的新壓力。西洋人要使你有科學，但他所要給你的不是科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而是要訓練你能爲高等的技工；封建的勢力勾上了實辦勢力後，也要科學，但也不是要科學的思想與科學的精神，而是要「技術」，這末一個不生的局面之下，中國人的科學能翻個身嗎？

無論從西洋的科學或中國的科學言，科學一樣的需要有自由的空氣，尤其是政治上的種種自由。中古的科學一定要從封建的政治中解放出來，一定要從腐臭的教會政治中解放出來，才會有近三百年的成就。近十數年來的科學，一定要從資本主義的政治中解放出來，企業家所掌握的政權中解放出來，人類才可以有自救之道；中國的科學一定要從封建與殖民地的政治中解放出來，從支持統治者的儒家思想中解放出來，才可以建立新科學的體系，才有獨立的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只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上自由經濟平等的民主政治才可以孕育出新科學，科學才不會爲某一部份人利用爲剝削或吃人的工具，人類才不會走上自滅之道。「從政治中解放科學」——這應該是一個新時代的呼籲，也應該是一個新時代的象徵。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於國立中央大學）

★ 我 的 沉 默 ★

我的沉默
是暴風雨的前夜，
是海，是火山；
是一個意志的持續，
是一種魔鬼的試探。
咬着，撲着，
不息地交戰着：
一匹獅子

和無數的鼯鼠，
在我的靈魂之深處。
像無弓的弦子，
像無指的鍵盤，
像不唱的歌，
我沉默着，啊，今天。

· 弦 紀 ·

一九四八年二月



物價有沒有辦法？

李立中

這兩天，朋友見面，第一句話就談物價。這樣險惡的局面，過去從未見過。商店每隔二三小時，即更改一次標價。甚至有些商店，被迫關門。理由是：「貨價飛漲，暫停營業。」

下面是六月間物價跳躍情形：

品名	六月一日	六月廿六日	上漲百分比
港匯	50	53	25%
台匯	50	53	25%
永紗	2,600元	5,600元	215%
怡紗	500元	1,300元	260%
白麵	600元	1,000元	167%
42支藍鳳	26,000元	100,000元	385%
21支雙馬	10,000元	41,000元	410%
龍頭細布	4,000元	11,500元	288%
固本肥皂	700元	3,100元	443%
美羅火柴	3,000元	11,000元	367%
大英香烟	1,000元	5,100元	510%
美孚火油	2,500元	8,500元	340%

去，如何得了？

本年底的物價情形將如何？這裏是一個簡單的預測。去年下半年物價每週上漲率是百分之六·六。今年上半年，則是百分之二〇·一九。超過前者，百分之三·五三。假使我們以今年上半年每週的物價上漲率，百分之二〇·一九，加上百分之三·五三，即為百分之二四·七二來預測本年下半年度的物價上漲率，則年底物價將為六月物價之二十

八倍。六月間批發物價之總指數為一七九萬倍，是年底物價將為一九三六年物價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倍。數字之驚人，有如此者。

目前問題，是要立即拿出辦法來。縱不能希望停止物價上漲，至少也須要緩和其上漲程度。

誰都知道，物價這樣狂漲，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財政收支不平衡，龐大的軍費政費，幾乎完全靠發鈔來應付。（五月份政府收入十五萬億元，支出七十五萬億元）大公報會謂，只要政府下大決心，宣佈停止增發鈔票，物價必停。這話等於不說，政府財政收入，若有辦法，何必發鈔？發鈔即等於無辦法。

政府財政收入之無辦法，從預算上，完全可以看出来，本年度下半年的預算，傳為一千萬億。（上半年預算九十六萬億，後追加到二百餘萬億）歲入部份，以貨物稅最多，約達二百萬億，關稅第二，約七十餘萬億，直接稅約四十餘萬億，合計三百餘萬億，連同其它收入，約五百餘萬億，不能平衡的數字，幾達一半。此不足之額，是否出售美援可以抵補？據估計，一年內出售全部美援物資，約可收回法幣四百萬億至六百萬億。若然，則在半年中，美援可收回之法幣數字，將為二百萬億至三百萬億之間。即使是三百億，則連同歲入部份之稅收，不過約八百萬億。此與一千萬億之預計支出相較，相差仍達二百萬億左右。更何況一千萬億之支出，不過是預計的數字？假使按上半年度追加預算之百

時事述評

英國實施社會保險制度

英國政府宣佈自七月五日起實施社會保險制度。這制度是以所頒佈的國民保險法、工業傷害法、國民協助法和國民健康法為骨幹，規定全國國民有享受醫藥、牙科、眼科方面的治療，以及領取產婦補助金、疾病補助金、失業津貼、寡婦養老金、退職年金和死亡補助金的權利。實行這種制度所需的費用，每年達八億二千三百萬鎊，其中由工人出資二億二千萬鎊，雇主一億五千五百萬鎊，其餘則取給於國家的稅收。

這種制度實施後，無疑的將引起世人的注目，因為這是今天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一重大考驗。究竟資本主義社會能否由溫和的改革步驟，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有待於這一制度的成效來說明。當然我們知道此種制度所包涵的價值是消極的保險及互助作用，並沒有全民就業以及消滅剝削制度的積極意義在內，所以距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還遠。

另一方面，英政府恰於此時實施這一制度或可鞏固工黨政權的效果，尤其在各方對工黨外交政策感到不滿的今天，意義更為重大。（成）

聖地復燃戰火

自從六月十一日猶阿雙方接受聯合國的建議而停戰以來，聖地上空已呈現了一線和平的曙光，但由於雙方拒絕聯合國調解專員斐那德於六月廿八日所提出的新和平方案，這一線微弱的曙光又被戰爭的陰霾所遮蓋了。

現四星期的停戰期限已於七月九日屆滿，雖則聯合國會一再要求展延停戰的期限，都遭阿方堅決的反對，聖地

分比計算，則下半年之預算，又須追加一千餘萬億。如是，歲出不平衡數額，將達一千數百餘萬億之鉅。此尚係保守之算法。

所以，我們看出，全靠美援，也不能緩和物價。緩和物價是不是完全沒有辦法？我們的答覆是有的。問題是在政府不肯毅然決然的做而已。

第一是嚴禁資金逃避——據匯豐銀行人員透露之消息，戰前該行存戶存款額在一千萬以上者，不過一、二戶；五百萬以上者，十餘戶；百萬以上者，亦極有限。至於戰後之新存戶存款額，在一千萬以上者，達一千餘戶；五百萬以上者近一萬戶；一百萬以上者，則不計其數。此不過香港外國銀行一家之存款情形，如加上其他銀行之存款，及經營投資與地產股票者，其為數之驚人，當不堪想像。天天港匯報稱，天天資金逃避，天天物價高漲，而政府視若無睹。此不啻是使大多數人之飢餓，換取少數人之利益。任何政府之金融政策，未有如此荒唐者。

第二是凍結游資——天天說游資來滬，游資作

中美簽訂雙邊協定

談判經時的中美雙邊協定，業於七月三日在南京正式簽字。根據美國會於四月三日所通過的「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規定援華的款項是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因經一度削減，現僅為四億美元，其中復分為經濟援助和特別援助兩種，經濟援助是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特別援助為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這一協定只提出有關經濟援助款項的使用原則，至於特別援助款項，則屬贈與性質，不附任何條件，當然也不受協定的限制。

協定的內容，主要的有下列幾點：1. 中國須採取可謂的措施，以利用全國資源及國民財力，發展工業及農業，改進財政幣制，減少貿易障礙，增進對外商業關係等。中國對於美國所缺少及中國所能輸出的物品，應依公平交易方式予美國以採購的便利。2. 由美援物資販售而得的國幣應如何處置，須經中美雙方代表協議，處置的方式約為(一)凍結(即收回法幣以安定金融及物價)，(二)供工礦鐵路建設及農村復興等工作之用。3. 美國有隨時停止或終止援助之權。

由上述的幾點看來，知道美國援華的目的，表面上固如所說的是「協助中國穩定經濟及早日建立國內和平」，但實際上也在擴展對華貿易和獲得所需的資源，一句話，我們獲得這筆援助款項是以優惠的美國對華貿易為交換條件的，是費了相當的代價的，一定要不待人家來監督，而自我地切實來執行自助計劃。

末了，應該注意的是這一協定僅僅是原則上的規定，至於執行上的許多技術問題，仍待探討，希望政府能一方面顧到美方的友誼，一方面顧到自身的利益，確實的訂立各項執行細則。(成)

三十七年六月卅日於復旦大學

崇，而政府却始終無凍結游資的辦法。筆者早就主張，利用改革幣制，作為財政手段，並做效蘇聯最近改革幣制，收回舊幣的辦法，消滅一部份游資，凍結一部份游資，而政府却固於一般陳腐的觀念，認為改革幣制，必須收支平衡，必須幣值穩定，而不肯有所作為。

第三是徵收自然人之財產稅——歷來政府的租稅政策，發鈔政策，都是使戰費負擔落在大多數人身上。政府固從未使極少數之有錢者出錢。所謂救濟特捐，終亦落在工商業頭上，而真正所謂豪門巨富，依然逍遙自在。事之不平，乃至於此。假使目前的收支不平衡，能有一部份，由自然人的財產稅來抵補。則經濟狀況，必大見改善。

時至今日，必須有非常手段，以應付此非常局面。假使仍在拖，仍在節節的求抑止物價，如目前所採行的措施：防止濫發本票，推銷國庫券，及派遣人員赴華北，改善匯兌辦法等，行將見下半年的社會經濟，更有不堪設想者。

的前線遂又重傳出了陣陣的砲聲，致使聯合國的調處人員也不得不狼狽的撤退，這無疑的，對聯合國的威望，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為了應付這個緊急局面，安理會當於七月八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雖則我們此刻還不知道所商討的內容如何，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出安理會又能拿出一個什麼樣的對策來呢？說穿了，猶阿衝突的幕後操縱者，還不是美英兩大強國嗎？假如兩國不能消除對聖地的矛盾，安理會是拿不出良好的對策的。就是勉強的拿出來了，也不會有效果。還不是再再一次的喪失威信，重遭一下打擊吧了(成)

中原會戰

中原會戰的爆發，早在各方的預料中。自從六月初共軍在魯西發動攻勢後，已露出了會戰的跡象，直到開封攻守戰發生，會戰的部署即已逐漸完成。不過正式的會戰序幕，却是在共軍從開封撤退後，各路共軍都已集結在黃泛區的時候，才算正式揭開。時間已是六月下旬，中間經過了十二天的激戰，到了七月七日共軍始全面撤退，而由國軍勝利地結束了這場空前的大會戰。

據國防部政工局發表的戰果，知道參與這次會戰的共軍，就主力而論，即有陳毅所屬的一、四、六、兩廣，快速等縱隊及劉伯誠的一、十一兩縱隊，再加上從開封敗退下來的陳毅三、八、十等縱隊以及土共金紹山、魏鳳樓等部，總數達十五萬餘人，及至會戰結束，共軍的損失在八萬人以上，其一、四縱隊傷亡過半，第六及兩廣縱隊也將近半數，三、八、十、十一及快速等縱隊各達三分之一不等，由此可見這次會戰規模之大，也可知共軍在會戰中損失的慘重，不僅粉碎了共軍盤據中原的美夢，也解除了共軍威脅江南的潛力，或者更進一步的說這次國軍獲得的決定性的勝利，實是戰亂戰爭過程中的一大轉捩點。(成)

本刊歡迎投稿

稿類：性質不拘。
稿費：每千字二元至五元，按京滬區公教人員生活指數計算。



從政治原理探討 臨時財產稅

李毓田

就財產權史講，初期原為共有制，漸漸發展為私有制。這私有制對共有制，本是一種進化，原為人類平等，每人都可以依和平勤勞去取得生活上的必需品，而禁止弱肉強食，互相殘殺爭鬥。但行之既久，弊病叢生，尤其自工業革命後最為顯著，財富集中，貧民加多，遂致釀成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現象。富者得法律保護，貧者却受法律壓迫，法律只重財產而不重人，厚於富而薄於貧，法律簡直專變成富者的護符。

共有制與私有制為財產制的兩極端，本來都有弊病；共有制的極端擴張，完全抹殺私人的自主，把人當做機械，但這種機械與物質的機械不同，它可以不受使用，其結果適招來社會的危機。蘇聯經濟政策所以一再變更，就是為此。反之，私有制的過度發揮，少數強者擁據鉅額財產，操縱壟斷，其結果亦足以造成社會的紊亂。故這兩種制度，都不是理想的完善的。實際，古代共有制亦並非絕對否認私人財產權，不過特偏於利他的觀念。現今的私有制，當然亦非絕對無利他觀念，例如國家或地方團體，固亦依租稅的方法，約束私人財產權，而剝奪其一部分，有時且以公用徵收名義，加以沒收。因為國家對國內財產權擁有最高的所有權，在一定的限度內，國家給私人一部分收益，這個可以說，多少帶有共有制的精神。不過現今特別着重自由利己主義，共有制的成分比較淡薄而已。所以，將來的財產，可能走入社會共有制，即調和共有制與私有制二者。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法國政府公布確認農民及佃戶執有農業財產的權利，新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工人得參加「企業的管理」。中國舊式商號學徒，早就有機會取得財產股份的權利，現今新式公司實行這種辦法的亦不少。最近察哈爾省傅主席作義，他有個口號是「工人的工廠」，主張省營工廠分配工人以股份。這是潮流，誰也不能阻止的。

人類因分工合作而營社會生活，普通是每人一方面為負債者，他方面又為債權者，這即所謂「社會連帶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就現今存在的事實看來，很覺不公平。即某種人負債太多，另一種人債權太多。具體言之，豪門富戶即負債太多，一般勞苦大眾（公教人員、農民、工人）即債權太多。豪門富戶，任何事不做，日進動輒以數十條（金）計，吸收他人血汗，揮金如土，長年度人間最豪華生活。反之，一般勞苦大眾，終日流着血汗，辛辛苦苦，為社會服務，但求一溫飽而不可得，這豈非中國社會最不公平之事嗎？普魯東稱「財產是贖物」，主張廢除財產權，固然不見得絕對妥善，但是，社會上債權債務之間，辦理這種清償，却是刻不容緩。這種清償辦法，即由國家以累進租稅之方式，向債務人課財產稅，以之償還於債權者，這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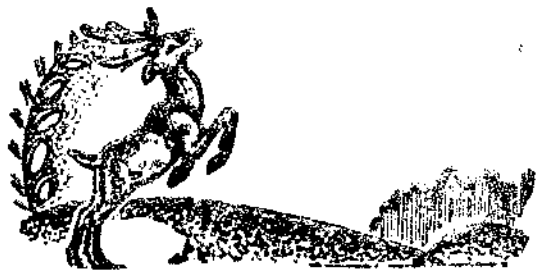
財產稅 (Property Tax, Vermögenssteuer) 由來已久，當羅馬時代即已有之，惟僅為一種戰時的非常稅，至於當做實質的財產稅，則為一八九三年普魯士所創設。當時普魯國改革稅制，是把地租，營業稅等的收益，讓於地方，為補充這種稅收因而便以財產稅來代替。一九一九年德國對於超過五萬馬克價值的財產，課以一成乃至六成六分的累進稅。一九一九年義國對於超過五萬里拉價值的財產，課以由四分五釐到五成的累進稅。一九二〇年奧國，一九二一年巴爾幹，一九二一年捷克等均於其建國後，設置財產稅。其他如英國、美國一部分亦均課征過財產稅。一九二六年日本大地震後，財政經濟調查委員會亦提倡地租，營業稅等委讓於地方，以救濟地方財政，另設財產稅來代替，即是仿效普魯國的。最近日本，因奉麥帥命令，設置戰時利得稅：(一)對於農民、工人、小企業家應設法保持其儲蓄；(二)對於軍需工業之戰時利得，應一律課以百分之百的稅率，對於其他法人及個人課以累進稅率，最高為百分之百，至

少應課以漸次累進的財產稅，稅率最高為百分之七十；(三)戰時利得稅對於日本人有道德的意義，使其知道戰爭並非營利之事；(四)此等租稅亦課於皇室財產。日本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盟軍總部提出財產稅、個人財產增加稅、法人財產增加稅三法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復發表了三法案的綱要。財產計分五類如下：(一)存款、儲蓄、公積金、寄託金；(二)國債、地方債、公司債、股份、出資；(三)壽險契約、金錢信託契約、有價證券信託契約、合會契約、郵政年金契約；(四)票據、支票；(五)投資信託受益權、收入印花、郵政匯票。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日本政府因受美陸軍的勸告，只成立了個人財產稅，一九四六年第二次財產稅法案提出於眾議院。本案與初案比較，有如次特點：(一)專課個人財產稅；(二)免稅點從二萬元升到十萬元；(三)稅率用超額累進稅率，對於超過十萬元部分，課百分之二十五，超過千五百萬元部分課百分之九十，稅收亦預定從一千億元改為四百五十五億元。法國新憲法草案序言宣稱：對於財產權，法律雖予以保障，但這種保障不是絕對的，要看財產使用對於社會效用如何。故財產的使用須加以管理。條文第每二十六條稱經濟的獨佔，將改為集團的財產，即歸為國有。第三十五條稱：「人必須以勞力及儲蓄而取得財產」，這就是追問財產的由來，任何人若不用勞力及儲蓄的方式去取得財產，那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中國自抗戰爆發後，政府便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口號相號召，但實際有錢者既未出錢，又未出力，八年長期抗戰，出錢出力最多者，還不是一般勞苦大眾嗎。當時代表民意的唯一機構國民參政會，曾向政府建議，「從速實施財產稅」。當時提案人是王曉籟，提案理由稱：「查我國戰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雖經政府多方平抑，成效不著。本年入春以來，漲勢尤劇，一般特薪津及其他固定收入為生者，日陷困境。而大地主、大資本家以及囤積居奇貪污聚斂之人，則頓成鉅富，兩相對照，隔若天淵，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夫社會經濟之大患，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不均與不安，日甚一日，若不亟謀補救，隱患堪虞。積極實施累進財產稅，不僅可以截長補短，調劑盈虛，且足充裕國庫，平抑物價，安定民生莫若於此。……」決議：「本案通過，送請政府從速籌劃辦理。」這是三十四年七月的事，現今的局勢，當然比那時更惡劣，更應該實施財產稅了。當時政府於收到這個決議後，仍不脫一貫作風，推拖敷衍，毫無誠意去辦。這次民選立法院成立，六月八日第八次院會，有委員劉不同等於是再「提議咨請政府，立即開徵臨時財產稅，以平社會財富而救危亡」。這次提案理由，據其對記者談稱：「我所提出的，是一套完整的

法律，諸如徵收豪門資本等等，都已包括在內。將來如能實施，則財政上可幫助收支平衡，而減低通貨膨脹，經濟上可以平均財富，並解決一部分土地問題。……資本家的理論，認為資本課稅，足以影響社會生產，阻礙繁榮，實則我的辦法，並未消滅資本，且將私人資本轉為國家資本，非但不致妨害生產，反由於資本的集中與國家化，而可增加生產。」這個提案，照豪門富戶的短見，當然是對於他們不利的。所以，六月八日院會討論這個提案時，便大遭豪門富戶代表的反對，而反對聲中最幼稚的是說：「國父遺教中，說明我國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抗戰後小貧也變成大貧，今天全都是貧人，不能再徵財產稅。」發此言的人，原想拿「遺教」嚇嚇人，可是他忘記國父所講的是什麼時代了，再加上閉着眼睛不看現實，所以很容易被對方駁倒了。據四聯總處駐香港專員所提報告：「以匯豐銀行一家而言，戰前國人存款在千萬元（港幣下同）以上者，僅一、二家，四百萬元以上者僅十多家，一百萬元之存款，僅一百餘家。今日情形大變，一千萬元以上存戶達一千餘家，五百萬元存戶達萬餘家，百萬以上不可勝計，其他投資及其他方式流入香港者，達三億之鉅。」(六月二十四日上海新民晚報)戰後存款數字何以比戰前超過如此之多？這即因為豪門富戶利用特殊勢力，從中操縱壟斷，發國難財，勝利財，戩亂財所致。現今中國問題，不僅不是「全都是貧人」問題，亦不是普通的貧富懸殊問題，而實是同歸於盡，抑共存共榮問題。我們實在不明白，豪門富戶何以仍在裝裝做做！

現在這個提案正在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審查中，不料全國財產集中的上海市參議會、市商會、工業協會等團體興起了軒然大波，紛紛起來反對，最後且推舉代表晉京請願。同時市商會市工業會籌備會發出緊急通告，謂誓為代表後盾起見，決定於本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各工廠齊鳴汽笛三分鐘，各商號張貼「反對摧殘工業的臨時財產稅」等標語。聲勢浩大兇猛，大有不達到目的不甘休之意。他們反對理由，據請願代表聲述有三點：(一)財產稅與憲法精神不合，(二)技術上困難，(三)工商業無力負擔。他們反對的聲勢，固然浩大兇猛，但他們所持理由，未免太洩氣了。第一、中國憲法的精神明明明白規定於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治民有民享之共和國」，並非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無限制的保護私有財產。第二、技術假若有困難，當然有方法可以解決，焉有因噎廢食之理。第三、農村貧民一家往往全靠一個壯丁而維持生活，政府尚能把這壯丁抽去，留下老弱不是乞討，便是全家自殺，有誰來管他們能負擔與不能負擔。有財產才能課稅，而且所課的稅不過財產中百分之幾，怎能說「無力負擔」？豈不是笑話。



遙度中原戰局

· 中 行 ·

西漢名將趙充國說：「兵難遙度」。現在我們身居遠離戰場一千五百里路程的地方，適值戰局緊張勝負莫辨的時候，當材料十分缺乏而所有報導又都有所偏袒有所隱諱的條件之下，來侈談中原戰局，真是一件難事。

但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有秩序有規律的。所以看到一片鱗，我們就能判斷他是蛇；看見一點光頭，我們就能判斷他是吉是凶。國共間的軍事鬥爭已經不是一天兩天和不是一城一地的事，舉一反三，鑑往知來，對中原戰事也不妨作一次情理之內的推度。

二

自從去年魯南戰事沉寂和冀中戰局收觀之後，中原的角逐便佔了軍事新聞的首頁。陳毅部盤據了黃泛區平原；陳賢部侵掠了豫西山地；劉伯承部蹂躪了整個豫南，皖西和鄂北，並生根於大別山脈。接二連三的有刺激的新聞都出在上述三個地區，相形之下，東北的長瀋，華北的平津都不大惹人注意了。

春天，陝北局勢棘手，國軍東西不能兼顧，遂令共軍垂手而得洛陽。洛陽「居天下之中，咽喉九州」為「南北要衝」(顧亭林語)，既入共軍之手，對中原軍事影響就大了。

共軍佔據了洛陽，把國軍東西的交通完全遮斷了。胡宗南軍與鄭汴國軍從此接不上「氣」。而共方却取得了一個寬闊的走廊，從雲中呂梁太行中條，經熊耳伏牛，過渡到桐柏大別，從長城到長江，這條大道完全打通了。

三

本年四五兩月，當南京忙着「會」與「選」的時候，共軍却乘隙完成了若干大行動與新佈署。彭德懷南出鳳寶窺伺漢中的企圖雖因涇渭谷地之戰而未能實現；但豫西南民團的老巢，所謂宛西四縣，却在一番苦戰之後被共軍佔去。在山東的昌樂戰役中，也是國軍喫敗仗。接着就是泰安城失守，津浦路再斷，濟南二次陷入被包圍狀態。在這前後，蘇北也在蠢動，皖北也在騷擾，鄂西北也在流竄，國軍顯然有點手忙腳亂，無法招架了。

就中宛西之戰實在有決定的意義。宛西民團有二十年的歷史。他在內亂中生長起來，經過抗日戰爭的錘煉而趨於堅實，在最近兩年的內亂中表現他的力量。共軍幾次侵犯他都不甚得手。然而他實在是共軍南北通道上的大障礙，是共軍經略中原與窺長江的大阻力。因為他屹然特立在豫陝鄂川四省交錯的地方，隔絕了伏牛和桐柏武當的交通。所以共軍在別處得手之後，便集中幾支強大的兵力，不惜任何犧牲，務在拔去這個眼中之釘。於是在一場血戰之後(共方損失約兩萬人，團隊死傷四萬人)宛西民團全部被摧毀了。

四

宛西民團被解決之後，共軍對中原地區又來了一個新佈置，這是真的「經略中原」。於是原在河北的各縱隊都相繼過河南下，原在豫西的各縱隊也紛紛東進。這樣，在六月初，這次中原大戰就開始了。

共軍開始的攻勢是在魯西。共軍在這方面有陳毅的第一，第四，第六，第七，新編第八，第十三，等縱隊，有劉伯承的

第十一縱隊，還有兩廣縱隊，快遠縱隊，總數約略有二十萬人。這二十萬人放在魯西平原，不僅破壞了津浦隴海兩條鐵路，交通，並且威脅着北面的濟南，南面的徐州，和西面的開封。

國軍爲了對付這個威脅，也使用了最強大的兵力，能征慣戰的邱清泉部和黃伯韜部都使用在這一方面了(但中央軍究竟有多少人，這是一個軍事秘密，報紙上也很少這一類的消息)。

魯西的戰鬥相當慘烈，也相當持久，但屢進屢退，雙方都沒有多大收穫。正當這時，共軍在平漢鐵路一線發動了新的攻勢——這大概是預定的計劃罷。

六月十日前後，陳毅部第三，第八和第十縱隊開始在舞陽葉縣一帶活動。六月十三日已在鄆城附近越過平漢鐵路，侵入西華縣境。這時，國軍還不大明白共軍東進的企圖，所以不十分注意他。而這三個縱隊，却毫不停留，轉向北行。六月十四日還在太康扶溝，十五日就穿過杞縣通許之間，十六日天明陳留便失陷了，十六日之夜間就到了開封近郊。這時國軍繞曉得共軍的企圖是攻擊開封，然而已經失之過晚了。

當時開封的防務十分薄弱，只有一小部份國軍和一些戰鬥力很弱而軍心又極動搖的團隊。援軍呢？西面鄭州的國軍孫元良胡璉等部不敢離開鄭州一步，因為共軍陳賢部的第四第九兩縱隊近在咫尺，隨時都能對他們攻擊。東面的國軍力量頗為強大，但是被魯西共軍糾纏着，不能抽身，不僅不能抽身西進，反而上了共軍的大當，更向北深入了。下列的電文便是明證。

六月十八日大公報載十七日徐州專電：「國軍精銳部隊雲集魯西，逐步向北進迫。……匪軍逐步北移……十六日，金鄉，城武，定陶，荷澤以北，鉅野，鄆城以南地區均入國軍控制。各部匪軍退集黃河南岸。國軍續自鉅野鄆城之線向北推進。」

正在魯西「密雲不雨」，「醞釀大戰」的時候，開封的攻守戰「白熱化」了。魯西的國軍很想西援開封，而且似乎在擺脫魯西的敵人，向西南「疾馳」了。但是「退集黃河南岸」的「匪軍」却吊在後面，不讓他輕易退走。據大公報十九日徐州專電：

「退集黃河南岸的陳劉匪部……十八日突自鄆城地區疾速向南反撲。國軍節節阻擊，戰況猛烈……現陳劉各部殘餘已分別竄抵定陶，曹縣，考城一帶……國軍主力回師向西南追擊中。」

請注意十八日的時間，和向南反撲的作用！顯然是在開封攻守戰「白熱化」的時候，阻撓國軍的西援。可是國軍雖「節節阻擊」，却擋不住共軍兩天兩百里（由鄆城到考城）的行軍。「國軍主力」顯然落在共軍的後面，不得不「向西南追擊」了。而事實上不是國軍追擊「匪軍」，却是「匪軍」反客為主，在魯豫邊境上「節節阻擊」國軍的西援開封了。

「匪軍」，進了開封（六月十九日）。

開封失陷了。河南留京代表到總統府作「秦庭之哭」。在大總統「赫然震怒」之下，中原戰局又開了一個新局面。

六月二十一日，總統飛鄭州，轉西安，親自決定了新佈置。於是五十個師動員了。從陝西，從平漢南段，從魯西三面向河南壓擠，想圍撲這大平原上的三十萬「匪軍」，而以收復開封為第一目的。

邱清泉的部隊，六月十九日由曹縣定陶西行，同行者有「匪軍」陳毅的第一和第四縱隊。兩軍一路走，一路打，所以行進很慢。兩百多里路走了一個星期，在總統發怒後的第五日，六月二十六，邱兵團才到了開封。這時，「匪軍」已將物資搬運一空而退走，殘破不堪的開封城內只剩下些「匪民」了。由鄭州向東「疾馳」的孫元良部也排除萬難，用七天的時間走了一百二十里路，於同日下午到達開封。

開封是收復了。

但是開封的收復並不重要，重要的却是開封收復後的黃泛區大戰。從六月底開始的黃泛區戰事是中原大戰的樞軸。他的意義不僅超過六月初的魯西戰事，恐怕還要超過兩年來所有的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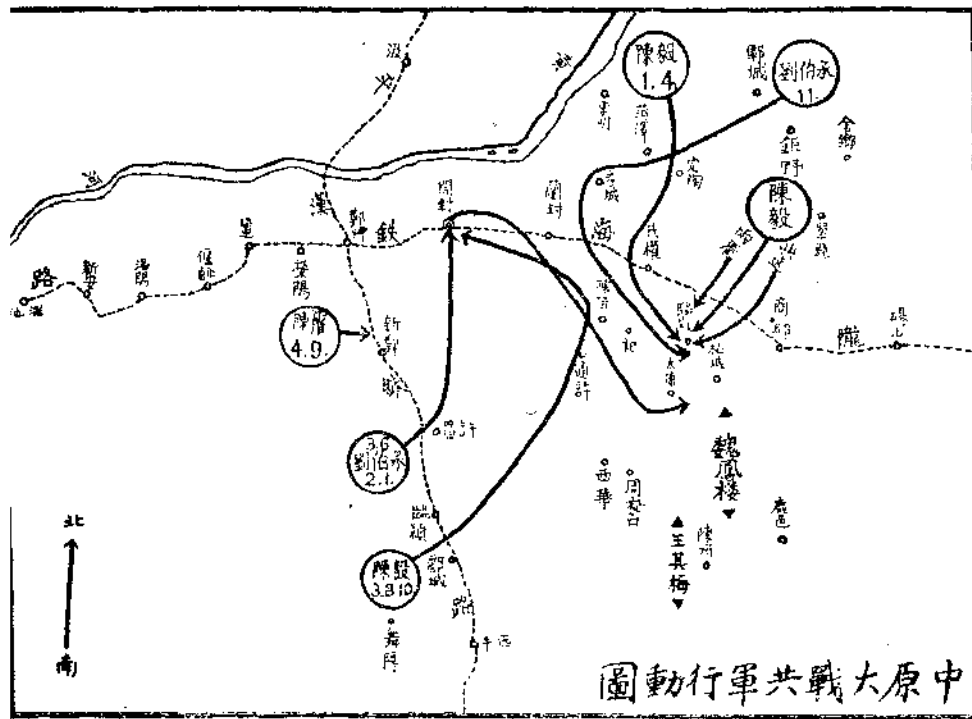
將大戰中心放在黃泛區，這是陳毅和劉伯承事先準備好的。有下面的事實可為明證：

一、由魯西地區南下的共軍，於六月十九日便分為兩股，一股是陳毅的一四兩縱隊，繼續陪同邱兵團西行；一股是陳毅部有六縱隊，向黃泛區東進。

民權野雞崗便一直南行，走入黃泛區，去佈置陣地了。

二、送邱西行的陳部一四兩縱隊也只送到開封西面。六月二十五日，讓邱兵團單獨西進，他們却回師東南，由杞縣入黃泛區，在那裏張羅設防，「以主待客」了。三、攻下開封的陳毅部三，六，十三個縱隊，得城不守，却帶着眾多的物資南走，走入黃泛區的更深的後方。四、劉伯承的二，三，六三個縱隊，也一直在黃泛區的西端徘徊逡巡，顯然是等候一個大戰。

「已有十一個縱隊，再加上參加攻擊開封的劉伯承部第一縱隊，逗留在隴海鐵路北面的劉部第十一縱隊，和黃泛區土共魏鳳樓王其梅兩縱隊，總共十五個縱隊，約略有三十萬人。把這未多的人集中在這塊地方，假若不是為了決戰，還為了什麼？」所以收復開封之後，國軍的南下追擊，實在是又中了「奸匪」的「奸計」。



中原大戰共軍行動圖

據報紙上的消息，國軍於六月二十六日收復開封，同日收復陳留。次日，六月二十七，收復杞縣及睢縣。共軍南退，戰爭在睢縣以南地區進行。看情形，國軍似乎很得手。但事出意外，徘徊在魯西的劉部「匪軍」第十一縱隊突然在六月二十八日越隴海路南進，攻擊國軍的後背。南進國軍後背受了威脅，自不得不回師搏戰。就在國軍回師的時候，南面的「匪軍」也改守為攻，開始反撲。到了七月一日，國軍已陷入被包圍狀態。於是睢縣又轉入共軍之手。七月二日，睢縣西面的龍王店的陣地被共軍奪去，榆柳似乎也失去了。（報上說：榆柳前有顯著變化），鐵佛寺遭受了猛烈的攻擊。七月四日似已達到戰爭之最高潮。固守該線之國軍如能支持住這一陣猛攻而等待援軍的到達，似乎還可能打一次勝仗，假若不能支持下去，黃泛區的勝負就難說了。七月五日夜，一編者按：本文脫稿時是在決戰的高潮。至於戰爭勝負等分析已函請者寄稿，下期刊出。）



論蘇共與南共的交惡

鄭學稼

正當東西兩集團的領導者忙於「冷戰」的時候，普拉主電台突然傳播這一驚人的消息：最近在羅馬尼亞會議的「共產情報局」(Cominform)發表公報，「宣佈開除南斯拉夫狄托元帥的黨籍，並號召南斯拉夫共產黨(簡稱南共)忠實同志更易其領袖。」誰如知道：南斯拉夫是所謂「新民主國家」的核心，狄托元帥是所謂「蘇聯衛星國」的指導者，誰對「國際情報局」的處分，就不能不感到事態的嚴重與複雜。

嚴重而複雜事件的發生，決不是突然的，會經過相當醞釀的時間。由於真相尚未外洩，還難明白全部的內情；但依一週來各通訊社的報道，却許我們稍為知道南共與「共產情報局」分裂的經過和原因。茲分述如下：

第一、早在本年三月二十七日，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中央委員會寫信給各國共產黨；只有南共除外。該信的內容，並未公佈。後來，匈牙利共產黨大概遵從蘇共的暗示或指示，也寫信給南共中委會，並將該信的副本分送各國共產黨中委會；但意大利與法國的共產黨除外。由上述兩宗事我們知道：蘇共的信，是關涉南共，匈共的信，可能是蘇共信的副本。所以，把法共與意共除外，那暗示事涉巴爾幹各國，或關涉蘇聯的衛星國，無需擴大於「鐵幕」之外。至於蘇共信的內容，自然是斥責南共，因為當南共接到匈共的信後，曾公開地說：「各兄弟黨之譴斥南共，為着只聽蘇共一面之詞。」

被南共公開斥為「妄誕和毀謗的謊話」的內容，與後日「共產情報局」的公報相同。

第三、由於蘇共與南共的對立，受蘇共指揮的「共產情報局」，就在羅馬尼亞某地召集會議。該局本設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突然更換地點，是免受南共的牽制。這次重要會議，南共並未派遣負責的領袖出席。會議結束後，發表斥責南共的公報，洩露過去蘇共與南共交涉的內容。該公報，依路透社所傳捷共機關報——「真理報」登載的要點如下：

一、南共將蘇聯的政策，與帝國主義的政策，相提並論，認為資本主義對南斯拉夫的危害，比蘇聯要少些。由之，南共視「蘇聯為侵略國」，從事反蘇、反蘇軍的宣傳，並派特務監視蘇聯在南國的專家們，和蘇共的代表巨丁(Gud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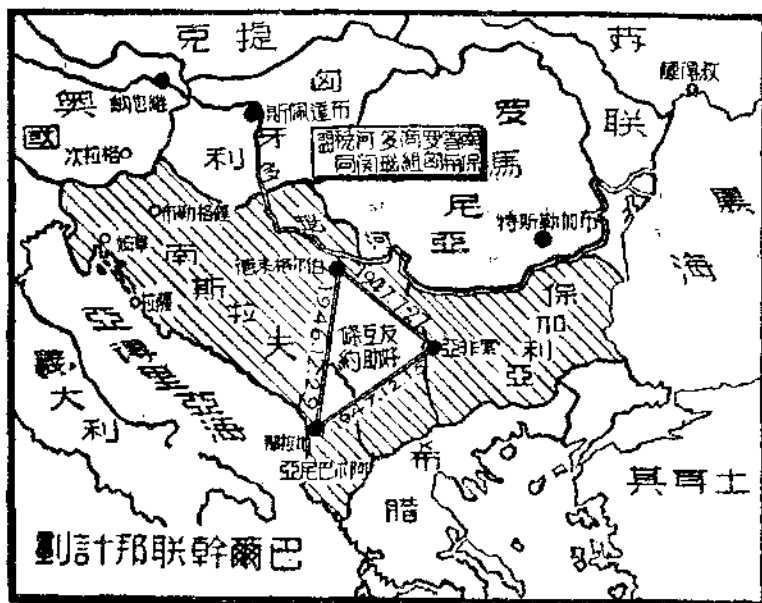
二、南共的對外政策，企圖與保加利亞等國建立巴爾幹聯邦——按最初提這計劃的，是前第三國際主席，保總理狄米特洛夫。蘇共的「真理報」，以狄氏主張有礙蘇聯對巴爾幹的領導權，在本年一月特撰文斥責。受斥責的狄米特洛夫馬上認錯。

三、南共黨內毫無民主，「對批判者，施以最殘暴的報復。」黨員被捕被逐之事，不斷發生。似乎親蘇——至少是不滿狄托們的南共中委巨卓維克(M. Zujovic)，希布蘭(Hebrang)因之被開除黨籍。

四、小商店國營，扶助古拉克(Kulak，即自耕農)。這些設施，「採用命令手段及急促；不可避免地引起嚴重之後果。」

五、拒絕出席國際情報局會議，由於「過去五、六月來，南共內部隱匿的民族主義份子，在南共首腦部中佔有地位。」受這類份子操縱的南共，就過份誇大自己的力量，以為無蘇聯及各國共黨之助，可以單獨實現社會主義。

我們如細心探討上述五點，發覺蘇共及其「共產情報局」所以不滿南共，要點在於南共之巴爾幹聯邦的計劃，和企圖充當巴爾幹的領導者。由這大前提出發，引起南共與蘇共的衝突並至於表面化。針對「共產情報局」的公報，南共中委會於六月廿九日以「最可能強硬的措辭」，答覆批判者。依牠，南共認為所有的斥責，是「向壁虛構的毀謗」，是「對我們之可恥的及可怖的侮辱。」為什麼呢？(一)南共否認會嚴密監視蘇聯代表，並以爲這謠言的目的，在使南共在他國共黨中喪失信譽，



接着反責蘇聯情報機關輕率地在南國招募特工。(二)關於農民政策，南共認為是遵行該黨決議案，並為趨向社會主義大道所得的成績。(三)「南共一向深信，今仍深信，南國對待蘇聯的態度，應以互信與誠摯為基礎。」(四)開除巨卓維克及希布蘭的原因，在於「把查明他們罪狀的公文，送給蘇共中委會。」(五)南共內部並無不民主，「二支部不能選舉，由於戰後的情況。」(六)並無實行國家主義之事。

因為南共否認蘇共及「共產情報局」的斥責，所以，聲明書的結語是：「此種加於南共、南國工人與民衆的無稽責言，實為歷史上不公道的行為，僅足為敵人宣傳的資料，南共不負此舉後果的責任。」由之，南共與蘇共交惡之最後的手段，是蘇共號召南共忠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員，驅逐被認為「托派」的領袖們；而南共則號召黨員團結，堅定步伐。

可以說，自有一共產主義者的國際組織以來，任何國際支部，從來未曾敢取南共的不敬態度。又可以說，自十月革命以來，在共產主義者眼中，蘇聯的威望，從未會受過這樣的藐視。南共的領袖狄托們，敢與蘇聯對抗，為着他們的地位，是由自己奮鬥得來，不似狄米特洛夫們，靠蘇聯的支持而取得政權。也為着這一原因，南斯拉夫是蘇聯的一與國，不似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是蘇聯的佔領國。

不僅如此。由於地理的形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之歷史的條件，南斯拉夫已成為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領導者。正為着這一事實，狄托們要求組織以南國為盟主的巴爾幹聯邦。如果這一聯邦成立，南國的力量增大，就有脫離蘇聯控制之勢。

國家」的煙幕下，蘇聯的真正目的是通盤打算地榨取「各衛星國」(她又稱為「莫洛托夫計劃」)，要達到這目的，必須使各「衛星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全受蘇聯的支配。

蘇聯事實上已取得那支配權。但為着自己經濟的、文化的相對落後，不能使「莫洛托夫計劃」與「馬歇爾計劃」對抗。我們應該知道，美國建立世界霸權，是以強大的生產力為前提，因此，她之剝削接受馬歇爾計劃中的國家，是探養雞取蛋的方式：先用自己的物力、財力、人力恢復別國家的生產力，維持該國家人民的一定生活水準，而後榨取她的經濟，以肥她自己。蘇聯由於戰爭的大破壞，和技術的落後，既無物力援助「衛星國」的建設，又欲為壯大自己而任意榨取別人。這一榨取，由於蘇軍的駐屯各國，及近十餘年來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賈輸，必然是擺征服者的姿態。這姿態，在南斯拉夫當然引起反感(所以才有南共宣傳反蘇及反蘇軍的斥責)。因為，模倣蘇聯的南共，已把狄托宣傳為南歐的史大林，牠的「大塞爾比亞」精神，恰與大俄羅斯主義相對抗(所以才有民族主義隱匿南共中的斥責)。我們又知道，在工業落後的南斯拉夫，狄托要把自己畫成英雄的面貌，必須取得農民的擁護。為着牠，過去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打倒皇室、大地主們，此後，為着牠，更當使有其田的耕者，團結於自己的周圍(所以被蘇共們斥為袒護古拉克)。狄托的這些設施，顯然可引起蘇共的不滿。因為，依蘇共的尺度，狄托的光圈幅度，不能等於——更不能大於史大林的光圈。在這基本的衝突中，再參雜南共中私人權益的鬥爭(所以有蘇共提及巨卓維克們的開除黨籍事)於是，南斯拉夫的英英雄狄托，在蘇共眼中變為神話中的狄坦(Titan)皮膚上「毛底」的巨象，區區「共產巨象」門之外。

但這裏有一問題，何以蘇共們斥責狄托，而「真理報」却沉默不言呢？那主要原因，在於南國的地理條件，遠離蘇軍，南國的實力，非其他衛星國的軍隊所能壓服，因此，保留一個轉圈的地步，免魯莽地把南國趕入美國的懷抱。聰明的狄托，也利用對方的策略，攻擊蘇共而強調親蘇，藐視「共產情報局」而禮拜史大林。他暗使一萬五千南共黨員致電史氏：「我們對你有深厚的信心，並相信你將盡一切可能取消加諸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和我們中委會之不公正的譴責。」正凝視煙斗中放出煙霧的史大林，對這些卑恭者的陳詞究表示何等的態度，我們還不知道。

於是，由於事態的棘手，南、蘇也發生「冷戰」。斥責南共的電文，不斷由「共產情報局」的支部傳來，表示一致聲討「叛徒」，貝爾格萊德的南共電台，也一一回答，並特別警告阿爾巴尼亞。至於謠傳下落不明的狄托，突然出現於京城，美國解凍南國資金甚至借款等等的報道，都作為神經戰不可避免的技術。在這裏洩露反受史大林主義教育之狄托們，有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表演。

南共與狄托的前途，還在未定之天，我們不能作任何的推測。但這對美國總是一個不壞的消息。因為，一旦南國真正投入西方集團，希臘北部的戰事，就可短期內結束。美國對於防蘇的計劃，由於地中海之一基地(希臘)的鞏固，可進而促南、土、希的聯防，形成一大環，把紅色的熊鎖在黑海之內。同時，也許可分一些時間，應付東亞的危局。至於，「鐵幕」之內，是否有南共第二，那不敢說，就目前情況看來，這一希望的實現性極少。可以斷定的，却有一點：由於狄托們的背叛，克里姆林宮的最高主宰，將愈加珍視這重大的教訓，不許有第二狄托。(七月六日)

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

● 室料資刊本 ●

面積

南斯拉夫在巴爾幹半島的西北部，三面接陸，西南面瀕亞得里亞海，乃第一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在第一次大戰以前，曾經是土耳其帝國的屬邦，也曾受制于奧匈帝國。他的領土是合塞爾維亞、門的內格羅二國及割奧匈帝國所屬的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土地而成。在二十四萬八千方公里的國土中多半是丘陵起伏的山地，依面積計算是半島上第一個大國。

人口

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共有入口一千六百萬，其中包括克羅的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馬其頓人及黑山人等。但以塞爾維亞人最多，約佔四二%。鄉村居民佔總數八七%，城市居民僅佔三三%，鄉村的農民中自耕農佔七九%。

民族

巴爾幹半島所以稱為歐洲火藥庫，是因為民族複雜紛擾時起，而各國中又以南斯拉夫境內所包括的更為複雜，詳細說來包括有十七八種人之多，風俗、習慣、宗教和歷史傳統各異，在過去的君主政體時代，塞爾維亞人是各民族的主宰，高倡着「大塞爾維亞主義」，在民族未能平等相處的情況下網羅着其他各個民族，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納粹入侵南歐，統治的王朝才瓦解了。狄托元帥所領導的游擊軍是由各民族混合組成的，經過無數次的奮鬥，日益強大起來，終成了反攻的一枝主力。到歐戰結束，南王彼得宣佈成立攝政會議，任狄氏為總理。這自然不能滿足狄托們的願望，後來，他就消滅所有的政敵，

組織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這共和國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決，效法蘇聯，根據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習俗和歷史分別組織了六個人民共和國；即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暨黑塞哥維那、馬其頓和黑山。

政治組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的制憲會議通過廢除卡拉治維奇的王統，改為聯邦人民共和國。從那時起，在大獨裁者狄托的領導下于次年一月通過了新憲法，把制憲會議改為人民議會，也就在這個新憲法中確定了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其最高政權機關是人民議會，代表着人民的主權，是由聯邦院和民族院平等組成的。聯邦院的代表是由每五萬人中選出一個，民族院代表由各共和國，各自治地方，自治州中分別選出三十、廿、十五代表不等。至于聯邦國家之管理機關為共和國政府，其職務的任命和解除由人民會議在兩院聯席會上決定。根據憲法上賦予的權力發佈命令與公佈法律，並有權監視聯邦法律之執行及監督其實施。在一二九條中載明：「人民議會主席團有權廢止或消除聯邦政府之決議、指令、命令或決定，如不符合該邦法令憲法及聯邦法律，」在一三〇條中各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議會也有廢止或取消各該人民共和國政府命令等的權力，在國家政權機關與國家管理機關的關係上，是政權機關高出執行機關，也就是說執行機關要向政權機關負責，這點可說是其憲法中的特色，與憲法第六條中「全國政權均出自人民並屬於人民」的含意相符合。目前狄托政權日趨鞏固，其所採的方法一方面為秘密警察與人民法庭，另一方面為對軍民施行政治教育，此外並推行青年運動。

工業國有

在第二次大戰以前，南斯拉夫的工業頗不發達，技術水準也很低落，五一%以上的工業都握在外國手裏，如經營加工業和煤礦業的是法國人，開採鋁和錳的是英國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人民議會把具有全聯邦性質的或適宜於各加盟共和國經營的私人企業，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一律收歸國有經營，通敵資本家的產業無報償的沒收，未通敵的經徵收後還給予若干報償。南國的工業本來就是落後的，因受戰爭的影響和破壞，戰事結束後

工業生產力呈現出顯著的激降，但在狄托政府有效的集中管理下至一九四六年紡織工業已恢復戰前的八〇%，皮革業已恢復到九〇%，電氣業到一〇〇%，食品業到八〇%，採煤和煉鐵都超過了戰前的水準。目前南國的經濟分為三個部門：即國家的、合作社的、和私人資本的。國家的佔着領導的地位，主要的工廠、銀行、貿易機構都收歸國有了，為全體人民服務，不再為少數資本家的利益所左右了。在國有國營和公有公營的基礎上，自一九四七年實施起至一九五一年五年的建設計劃，其發展的要項為重工業，尤其着重機器製造、火車頭製造、鍋爐、製管、自動曳引機和農業機器等。看此共和國政府成立到目前發展的趨勢，這計劃是有希望完滿達成的。

土地改革

新憲法第十九條中規定着「耕者有其田」的綱領，附註上說得好：「本身並不耕種的機關及個人能有何種數量的田地由法律規定之。」又說：「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大規模田產不得握在私人手中，私人田產的限額由法律定之。」國家特別保護貧民及中農之利益，以低息貸款、捐稅制度及整個全體經濟政策援助貧窮的農民及中農。南斯拉夫是歐洲落後的農業國家，但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開闢國營農場有一百五十四萬九千六百猶特，在國家所辦的訓練班中造就了二千五百名曳引機駕駛員，工作隊領袖和會計員。從大地主、教會和超過限額的富農手裏分來的土地除開為國營農場外，也有的轉交給貧窮的農民供其終身使用的，不過法律規定農民所得的土地在二十五年之內，不得分割、出售、抵押或出租。一九四六年分得土地的農戶就有三十一萬四千家。不但給予他們土地，並給予耕種與收割上種種的訓練與協助，國家訓練班和勞動合作社就是這種性質的機構。農民與工人的協作已成了東南歐各國的時尚。這種協作，不但使耕者確實的能得到要耕種的土地，在鄉村裏也足以打破貴族地主的封建勢力，若說這點是各該國共產黨人的治績之一，總不能算是誇張的。



簡寫南共領袖

劉潤田

在憤怒和苦難中

人民巨人孕育出狄托

鬥爭——就是他的母親

狄托——這是我們的全體

從這些詩句裏，我們可



以知道南國人民對這位民族英雄的愛戴。提起狄托，很自然的就會讓人們想到共產黨和蘇聯，它們中間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的，請看這段小史。

「狄托」(Tito)乃是他抗德戰爭中的化名，真名字叫約瑟夫·勃羅茲(Josip Broz)。一八九二年生于克羅西亞地方的農家。幼年繼父業為冶金工人。第一次大戰時，曾被奧匈帝國徵調到東戰場去，一九一五年因受傷被俄軍俘虜，或云自動投降。後來，他因反對沙皇，被充軍西伯利亞，到俄國大革命爆發才被放出來。自由後，他又加入布爾塞維克。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間他入黨校受訓，到一九二四年才回國，那時它已改稱南斯拉夫了。其後的漫長日子却為黨務而忙，忽而巴黎，忽而維也納，忽而莫斯科，也有一段長時間是被關在牢獄裏。喜交際是他的個性，談起話來頗具幽默感，因此人民和士兵對他都很親暱。好學不倦的精神，促成他對俄、德、英、法各國國情和歷史的瞭解。走路和養狗，簡直是他的癖好，那隻「虎兒」幾乎隨時都要陪伴在身邊的。健康兼精神充沛的胖狄托，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沒進過甚麼軍校，但接近他的人說他有學者風度；打起仗來，勇敢又透露着

「總有辦法」。在第二次大戰中，「偷渡羅列特瓦河」之役常被喻為平生最艱險同時也最快樂的日子。他領導的游擊軍最後擴充到五十幾萬人，常採取機動和流動的戰術打擊敵人，在配合盟軍反攻上有極大的成就。

狄托是在抗戰中造成出來的英雄，他的成功完全由于半生的艱苦奮鬥，他想把接受于蘇聯的全部觀念，方法，偏見和傳統，不折不扣的在南斯拉夫來一個翻板，這野心，在擊敗一切政敵以共黨領袖身份出任國務總理兼國防部長之後，尤來得明顯而堅定。他不願國內希臘正教徒們的抱怨，也不願其他民主國家的反對，只以克里姆林宮紅人的身份，大膽行動：擊落美國的飛機並封閉其新聞處，向希臘挑釁，鬧翻了巴黎和會……

南斯拉夫的情形和蘇聯一樣，實權是操在指導共黨的少數集團手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除狄托外尚有五個人值得我們介紹：副總理愛德華·卡地爾(Edward Kardelj)是站在狄托背後權勢最大的人，乃共產運動中的智囊和靈魂，由那副金絲眼鏡下的短髮和中等肥胖的身材可知他是位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本來是研究辯證法的名教授



，長俄語，通法文，對西方情況瞭解甚詳，但大部份的時間却在逃亡中過日子；他曾逃避保羅國王的壓迫，逃避納粹的迫害，最近說不定，又要逃避蘇聯的攻擊了，因為他是共產情報局忌恨的主要對象。其次我們要提到的是不管部長吉拉斯(M. Mi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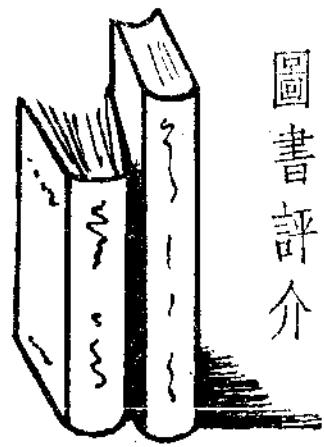
ovan Djilas)，他是一位頭髮黝黑的大箇子，生于門的內格羅，他早年就和狄托一起從事共黨活動，且與薩軍關係極深。這位將軍飽嘗過鐵窗風味，過去討厭西方人只顧



和蘇聯人交往，以後對英美的態度怎樣，那不能預測。一般人常說他的權力沒有蘭考維克(D. A. Rankovich)大。蘭氏是南國的內政部長，兼管秘密警察(OZNA)。狄托的統治力量所以那樣被人稱道，都該歸功于這位裁縫出身的鄉下人。由他的灰色眼睛裏經常放射着一道剛毅而冷酷的光芒，令人害怕。此外還有兩位都是關於黨務方面的人物，其一是南共書記長兼國會副議長墨沙慕加德，另一是各黨聯合組成的人民陣線書記長蘇喬治將軍，前者是赤化南國的設計人，短小精幹，已是個老頭子，懂中國歷史也愛慕中國文化；後者不但能打仗，成為狄托的左右手，且會籌措戰費，曾任過財政部長。以上所述的幾位領袖實握着南國的神經中樞——我們應該知道南國的政權並非操在狄托個人的手上，何況狄托本身又僅是一個會打仗的老粗呢？

這次蘇聯對狄托個人和南斯拉夫國家施加壓力，也許更增加南國人民對他們的信賴。至於南共的態度，在七月廿一日的第五屆代表大會中將有更顯明的表現。難道邱吉爾在一九四四年所說的話「狄托元帥的共產主義者面貌已被其愛國領袖身份所掩蓋」是兌現了嗎？南斯拉夫能在蘇聯瞭解的情況下獲得美援嗎？等等問題都嫌言之過早。根據過去的經驗只有一點許我們斷定的，那就是這位五十三歲的銀髮老人除招集他的政治局首領會商外，又照例的一個人住在所附近的院子裏踱來踱去的沉思着。

圖書評介



「愛因斯坦傳」

著者：Philipp Frank

出版者：Alfred A. Knopf

時期：一九四七年

定價：美金四元五角

弗蘭克教授的「愛因斯坦傳」(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是一部佳作。牠不僅給讀者知道主人公的生活與思想，而且用通俗的文筆，敘述那思想的内容。許我們如此說：牠是從事科學與哲學的研究者應讀的一本書。

在亞爾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未出現前，物理學界的王座，是被牛頓佔據的。牛頓主義的物理學，支配到第十九世紀。牠「解答」所有機械學的難題，天文學上基本的難題，又開始探究熱的諸現象，研討光學，並會觀察物質的內在結構。古典物理學常受機械學觀點的支配，認為一切現象的發生，係由於遠處諸力對不變量的推拉作用。可是，到第十九世紀末，牛頓的理論，却面臨許多不能說明的難題——尤其是光與電的現象。著名密契爾生·莫爾萊 (Michelson-Morley) 的光學試驗，確定地證明沒有「以太」的存在，並指示這事實：光速與光綫對地球運動的方向是相同或相反，常無關係。愛因斯坦綜合各種牛頓學說無法說明的現象，勇敢地提出三大建議：(一)放棄「以太」的理論；(二)光速與放射及接受體之運動無關；(三)否認絕對運動，主張運動只是相對的。「物理學諸規律，在協調的體系中，有純一的運動，

彼此有相對的關係。」所謂相對論，即奠立於(二)與(三)的建議上。愛因斯坦從那三大建議出發，否認牛頓學說的絕對觀念(運動、時間、長度、質量、空間等等)，把宇宙間的諸現象，視為相對的，量在特殊條件下是可變的。由之，鐘與速度有關，並因速度 (velocity) 之變而變；同理，測度空間距離的碼尺，也具速度有關，如牠的速度和光綫一樣，那碼尺就縮為無有；至於質量 (mass) 隨速度的增加也有比例的增多。這一新的觀念，不僅使物理學發生革命，而且日後還依牠製造第十九世紀科學家罕會料想的原子彈。

但這不是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完全否定牛頓的機械學，他只認為舊的機械學，可解釋能夠解釋的現象，也就等於說，他視牛頓的學說，只適合於特殊的情況。至於他的相對論，則由諸實驗證實牠的普遍性。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受科學家承認後，震動了人類的思想界，連坎特伯利 (Canterbury) 的大主教也寫信問他，相對論與宗教有何影響。至於哲學方面，為着相對論重視觀察者的地位，有的哲學家，就利用牠增強主觀主義的與唯心主義的結論。可是，如弗蘭克教授所指出的，那一主張者忘却一

個根本點，即相對論係基於這事實之上：四度「空·時」(Space-time) 是一種尺度，牠同一地供給在測度中的觀察者，並無絕對的價值，與人類觀察者的任何動作、意欲無關。

有那麼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就他的個人行動(社會的及政治的)而言，却受各方面不同的批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反軍國主義者，拒絕簽署「九十二個德國知識份子的宣言」。因為牠宣稱：「德國的文化與德國的軍國主義是同一的。」為着他的拒絕，他受許多德國科學家們的責難，他們並宣佈他的學說，是「非德國人的」！至於英、法科學家，也有人公言相對論與英、法的思想不合。到納粹登台，希特勒門徒宣稱相對論是馬克思主義之唯物論的變形，而蘇維埃博學之士，却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資格，指示相對論為「有產者的唯心論」。

本書作者告訴我們：偉大科學家之所以偉大，在於他有獨立的思想。愛因斯坦的性格，又有維持獨立思想的勇敢。任何批判，他不以為意。他只說自己認為應說的話。他只思考自己認為應當思考的事。因此，他的思想，不能用固定的模型去測度。他不屬於任何政派。他雖是猶太種，却無民族的成見。他深惡軍國主義，可是他供給軍國主義者以製造原子彈的理論。雖然去年五一節時，莫斯科的「真理報」列他為「蘇聯之友」，而他却是獨裁制的憎惡者。他曾說：「……為着這一理由，我常常熱忱地反對現今俄國及意大利(按指莫沙里尼獨裁的時期——筆者)的統治。」

總之，讀完弗蘭克教授的著作後，每個人會發現他的筆下的愛因斯坦，是一位具有善良心靈的科學家、自由思想家、人文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音樂愛好者、他的時代的大思想家！(禾)